

从本土秩序到现代帝国治理:俄罗斯帝国下哈萨克社会的转型

帕提哈西·塔拉甫别克¹ 张哲²

(1.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58;2.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本文以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哈萨克社会为例,考察帝国现代化进程中,本土部落社会秩序被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路径。文章指出,哈萨克部落社会的深刻转型并非始于苏联时期的社会改造,而是在俄罗斯帝国由传统统治形态向现代帝国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已然启动。随着帝国治理能力的提升、行政与司法体系的重组以及“文明史观”的扩散,俄罗斯帝国通过行政区划、土地制度与法律规范,持续介入原本嵌入游牧生产与部落结构之中的社会秩序,使其逐步被纳入一种以可测量、可规范与可干预为特征的治理框架。本文以“现代帝国治理”为分析视角,强调帝国治理并非静态的因俗而治的形态,在治理理性现代化的推动下,通过制度重组、系统性重塑既有社会秩序,从而深化了对帝国类型转型与本土社会结构变迁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理解。

关键词:哈萨克社会;部落;俄罗斯帝国;现代帝国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26)02-0097-10

引言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部落并未随着国家形态的现代化而消失。相反,它们展现出一种跨越前现代、帝国与当代民族国家的制度韧性。以欧亚草原的哈萨克社会为例,部落及其延伸结构长期构成了社会组织与秩序运行的基础,不仅塑造了人们对血缘、婚姻与互助的理解,也在相当长时期内承担着资源配置、冲突调解与政治动员等功能。即便在高度制度化的当代社会,多数哈萨克人仍能清楚辨识自身的部落归属,并遵循诸如“同一部落七代禁婚”等谱系规范。这一事实本身即提示:部落并非简单的“前现代遗存”,而是一种能够在不同政治形态下持续调整自身位置的社会结构。

部落在不同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在前现代情境中,部落是一套深度嵌入生产方式

与治理实践的制度性秩序,其运行直接关涉社会整合与生计组织;在当代社会,部落更多体现为一种身份框架与象征资源,其影响主要通过社会网络、认同叙事与非正式关系发挥作用,而不再直接组织社会运行。哈萨克社会的现代转型,并非表现为部落的消失,而是体现为部落制度功能的转移与社会位置的重组,即部落逐步退出正式的生产与治理体系,其作为制度性秩序的功能受到削弱,但其社会关系结构与文化意义并未因此消散。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关注的是部落何时、如何发生性质转变:以部落及相关结构为基础的哈萨克本土社会秩序,究竟是在何种历史阶段、在何种结构性条件下开始发生转型的?部落制度又是如何从一套实际运作的社会组织与治理机制,逐步转化为主要承载象征意义与文化认同的身份标识的?换言之,部落是如何从一种嵌入社会运行

本文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基金项目“哈萨克斯坦国族建构中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6-01-23

作者简介:帕提哈西·塔拉甫别克(1990—),女,哈萨克族,新疆阿勒泰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区域国别。

通信作者:张哲(1981—),男,新疆乌鲁木齐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的制度性秩序,转变为一种被重新编码的社会关系与象征性资源的?

围绕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多将部落制度的质变归因于苏联时期的社会改造进程,认为随着集体化、定居化与现代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苏维埃政权通过对忠诚、身份与政治归属的重新界定,进一步压缩了部落作为社会制度运作的空间,并在既有制度基础已被削弱的条件下,加速了其制度性功能的解体^[1]。这一阐释将苏联之前的帝国统治,尤其是俄罗斯帝国时期被视为一种“因俗而治”的政治形态,帝国通过承认地方习俗与中介结构来实现间接统治,并未根本破坏当地的社会制度。这一理解与经典帝国研究中对“传统帝国”治理逻辑的概括高度契合,即帝国依赖差异化统治、习惯法与地方精英来维持秩序并维系其广阔疆域,而非对社会结构进行系统性重塑或追求制度统一^[2]。

但这一解释难以说明在苏联统治全面展开之前,维系部落社会运作的生产方式、权力结构与规范体系,何以显现出持续且显著的松动?如果帝国时期仅仅是对既有秩序的“外在统治”,为何在进入20世纪之前,部落已开始逐步丧失其作为社会组织与治理机制的制度性功能?

本文提出,破解这一谜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传统帝国与现代帝国这两种不同的治理形态。尽管俄罗斯帝国在形式上延续了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但在19世纪下半叶,其治理逻辑已发生深刻转变。晚期帝国在行政理性、信息能力与治理目标上的变化,使其越来越接近现代国家的运作逻辑。俄罗斯帝国在19世纪后半叶通过行政区划重组、法律整合与人口管理等方式,显著强化了其对哈萨克社会的介入。

具体而言,俄罗斯帝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主要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影响哈萨克社会的既有秩序,并重塑了部落制度赖以运作的结构性条件。首先,技术与经济层面的现代化显著提升了帝国的治理能力。铁路、电报与印刷技术的引入,改变了帝国对空间、人口与资源的管理方式,使中央政权能够更有效地介入草原地区的社会运行。其次,行政体系的现代化改造推动了治理模式由间接统治向直接治理的转变。通过重新划分行政区划、调整司法体系以及引入农业移民,帝国逐步削弱了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逻辑,并促使哈萨克社

会向定居化、行政化的方向调整。最后,“文明史观”作为一种具有规范性的意识形态,为上述制度变革提供了正当化框架。在这一观念体系中,定居农业与工商业生产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而游牧及其所依托的部落结构则被界定为需要被改造的对象。

本文正是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统治下哈萨克社会的考察,分析现代帝国治理逻辑如何通过制度重组,持续削弱本土社会秩序赖以运作的结构性条件。本文关注的并非部落在文化或身份层面的延续,而是部落作为一种制度性社会秩序,如何在现代帝国治理的介入下被重新编码,并由此为后续历史阶段的进一步变迁奠定结构性前提。

一、作为社会秩序的哈萨克部落:血缘、地域与游牧社会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部落”并非单一、静态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类在特定历史与生态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组织方式。早期人类学研究曾将部落置于游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的演化序列之中,用以描述社会复杂化的不同阶段^[3]。然而,后续研究逐渐指出,这一线性演化模型难以解释不同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制度多样性。部落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前国家”或“低度组织”的社会形态,而应被视为一种在特定生产方式、生态环境与治理条件下高度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其具体结构与功能在不同区域与历史情境中呈现出显著差异。

本文所讨论的哈萨克部落,形成于15世纪至18世纪间的哈萨克汗国时期。在国家权力尚未以固定行政机构全面覆盖草原社会的背景下,部落并非国家统治的附属单位,而是组织社会生活、协调政治关系与分配资源的核心结构。至哈斯木汗时期(1511—1523年),哈萨克汗国的政治版图与人口规模达到高峰^[4],随后在16—17世纪逐渐形成以大玉兹(Ұлы жүз)、中玉兹(орта жүз)与小玉兹(кіші жүз)^[5]为代表的超部落联盟体系。玉兹并非单纯的血缘集合,而是在军事动员、政治协调、资源整合层面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下再由乌如^[6]等血缘群体构成更为细密的社会网络。

在这一社会结构中,血缘谱系(шежіре)^②构成

了部落秩序的重要基础。谱系不仅用于追溯共同祖先、界定群体边界,也在婚姻规范、社会身份与权利义务的分配中发挥制度性作用。围绕谱系展开的神话叙事与历史记忆,为部落成员提供了共享的起源框架,使血缘关系得以在代际传承中持续巩固。由此,谱系并非单纯的文化象征,而是一种嵌入社会实践之中的制度工具,用以维系部落内部的凝聚力与秩序。

哈萨克部落秩序与地缘资源的配置高度相关。三大玉兹的空间分布紧密围绕草场、水源与季节性迁徙路线展开,不同部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相对稳定但具有弹性的游牧范围。地缘边界并非固定领土意义上的疆界,而是依据生态条件与资源使用经验不断调整的结果。这种基于环境适应形成的空间安排,使部落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固定行政区划之外,也构成了其区别于定居农业社会的重要特征。

游牧生产方式是联结血缘结构与地缘安排的核心纽带。依赖性畜牧放牧的经济形态要求高度的空间流动性与集体协作性,季节性迁徙不仅是一种生产策略,也是组织社会关系、分配资源、应对风险的基本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土地多以集体使用为原则,而畜群则作为家庭或个体财产而存在。部落是协调迁徙节奏、调配牧场资源与应对自然不确定性的关键单位,使游牧生产得以在生态环境高度不稳定的条件下持续运作。因此,游牧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塑造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与治理方式的生产模式。

在此基础上,哈萨克部落形成了一套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高度契合的权威结构与治理机制。政治权威并非通过固定的官僚体系运作,而是分布于可汗、比(法官)、巴特尔(勇士)与长老等多重角色之中。其中,比作为习惯法的裁决者,在调解冲突与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巴特尔则凭借军事能力与个人声望获得社会影响力。这种权威结构并非单向度的等级统治,而是一种在军事能力、司法实践与社会认同之间动态平衡的治理形式,其合法性来源于长期实践与集体认可,而非成文法或官僚授权。

总体而言,哈萨克部落社会并非一种松散的或临时性的社会形态,而是一套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地缘资源为依托并与游牧生产方式高度耦合的综合性社会秩序。与其他游牧社会相比,哈萨

克部落在制度层面具有若干显著特征:其一,以“七代外婚制”为核心的婚姻规范在部落内部严格执行,该制度通过系统性的限制,持续拓展跨氏族、跨部落的社会联系网络,从而在草原社会中构建起高度延展的亲属结构;其二,哈萨克部落的游牧以长距离、跨区域迁徙为主要特征,季节性转场往往跨越广阔空间,对草场协调、资源调配与集体行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上述条件下,部落不仅承担血缘认同与文化遗产的功能,更成为组织迁徙、调节资源使用与维系社会秩序的关键制度单元。

正是这种在亲属制度与长距离游牧实践中不断被强化并具有高度制度化特征的部落秩序,使哈萨克社会得以在前现代政治结构中保持较强的自治性与内在稳定性;但也正因为其运行逻辑与现代国家对空间、人口与资源进行可视化、可计量与可控制治理的要求存在根本差异,它在近代帝国治理逻辑介入时,不可避免地成为被重新界定与重塑的核心对象。

二、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哈萨克部落:从间接统治到制度介入

自 16 世纪以来,哈萨克汗国在内部权力竞争与外部冲突并存的情境中,整体上维持了其政治框架与社会秩序的延续性。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亦逐步展开向东方的领土扩张,并开始与哈萨克草原社会发生持续而制度化的接触。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随着准噶尔汗国军事压力的加剧,哈萨克汗国在区域权力格局中的处境日益复杂化,部分哈萨克政治精英开始主动寻求与俄罗斯帝国建立政治与军事上的合作关系。18 世纪起,俄罗斯通过修筑防御工事、设立贸易据点并且与可汗、苏丹缔结臣属关系等方式,逐步将哈萨克草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

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帝国对哈萨克社会的治理仍然具有典型的传统帝国特征。帝国将草原区域视为人口流动、定居形态不固定且主权边界相对模糊的空间,对哈萨克部落的认知亦较为概括和模糊^⑦。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帝国主要依赖对部落精英的封赏、结盟与制度性吸纳,通过军事保护、质子制度、贡赋安排以及对宗教中介的有限扶持^⑧,与哈萨克部落建立间接统治关系。这一模式并不以改变部落社会的内部结构为主要目标,而是着力于维持哈萨克地区的相对稳定与最低限度

的政治服从。

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相当长的时期内,哈萨克部落社会在俄罗斯宗主权之下,仍然保有较高程度的社会自主性。游牧生产方式持续运作,部落仍是组织迁徙、分配资源与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单元;比、长老与部落贵族在司法裁决、社会调解与政治协调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9]。尽管帝国尝试通过设立贸易中心、学校与行政机构,逐步引导草原社会向定居化与行政化方向调整,但这些举措在当时对普通哈萨克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仍然有限。这一现实也反映出,传统帝国治理模式在广阔草原空间中所面临的治理能力的约束。

这种以部落精英为中介的间接统治,虽然在短期内有效降低了帝国的治理成本,却同时暴露出其内在结构的局限性。一方面,帝国官僚体系难以准确把握草原地区的人口、牲畜与资源状况,草原社会在行政与财政层面长期处于“不可计量”的状态;另一方面,税收、司法与治安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仍需要依赖部落权威的配合。这种高度依赖地方中介的治理方式,逐渐无法满足帝国在财政汲取、社会控制与行政整合等方面不断上升的制度需求。

19世纪下半叶,随着俄罗斯帝国自身发生深刻转型,上述治理模式开始被系统性地重新评估与调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帝国在废除农奴制、推进行政改革与引入工业技术的背景下,逐步迈入一种现代帝国的发展阶段。铁路、电报的普及以及印刷技术的提升,显著提升了国家对空间、人口与信息的掌控能力,使边远地区不再仅仅是通过地方精英进行间接管理的外缘空间,而逐渐转变为可以被测量、规划与直接治理的对象。草原地区在这一进程中被逐步纳入更为统一的行政、司法与教育体系之中。

伴随着治理能力的提升,俄罗斯帝国开始对草原社会提出更高层次的制度同质化要求。定居农业、固定的行政区划以及标准化的法律体系,被视为实现有效治理与社会整合的必要前提。在这一治理逻辑之下,依托长距离游牧与部落协调机制运行的社会秩序,被重新界定为低效、不可控且需要改造的对象。帝国对部落的治理,由之前以象征性服从为核心的间接统治,逐步转向以行政、法律与土地制度为手段的制度性介入,其影响开始深入土地使用、迁徙模式、精英角色与司法实践等

关键领域。

随着俄罗斯帝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哈萨克部落社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逐渐引起同时代观察者的关注与忧虑。1902年,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在其著作中对哈萨克社会的未来作出悲观评估,将哈萨克人比作“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红色印第安人”,并指出,在征服与土地重新分配政策的影响下,哈萨克人正不断被挤压至边缘且资源贫瘠的地区。在约翰·弗雷泽看来,这一进程正在削弱哈萨克部落赖以维系的土地基础与生计条件,使其面临向定居社会转型或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历史前景^[10]。

此类同时代的论述并非单纯的文化偏见,而是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帝国治理方式转型在草原社会中所引发的结构性紧张与制度性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萨克部落社会开始从一种以地方秩序为核心的治理结构,逐步被纳入现代帝国以行政、法律与经济制度为主导的治理框架之中。接下来,本文将以制度史材料与历史文献为基础,具体分析这一制度性介入是如何在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法律体系等层面,重塑哈萨克部落社会的运行逻辑的。

三、哈萨克部落的剧变:现代帝国治理下的社会重构

俄罗斯帝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帝国转型的过程中,并非仅体现为权力中心的制度改革或技术进步,而是通过一整套以可测量、可规划、可规范为目标的治理技术,深刻改变了其所统治社会的运行条件。对哈萨克部落社会而言,这一转型并未以单一政策或突发事件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对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治理机制的持续介入,逐步重塑了部落社会赖以运作的制度基础。

与传统帝国主要依赖象征性宗主权与地方中介不同,现代帝国更强调对人口、土地与社会关系的直接管理能力。在这一逻辑之下,哈萨克部落社会不再仅仅被视为需要维持稳定的边疆社会,而是被重新界定为一个需要在制度层面被整合、在空间层面被固定、在法律层面被规范的治理对象。本节将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法律体系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系统分析19世纪下半叶以来哈萨克部落社会所经历的结构性变化,揭示现代帝国治理是如何借助不同制度工具,对同一社会秩序实施多重重构的。

(一)生活方式:从游牧到半定居的转型

作为一种高度依赖空间流动性与部落协同机制的生产方式,游牧并非仅是哈萨克社会的经济活动形式,而是其社会组织、资源分配与权威运作得以成立的核心制度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 世纪下半叶以来逐渐出现的定居化与半定居化趋势,并非单纯的经济调整,而是一种具有深刻治理意义的结构性转型。

历史记录表明,尽管早期的哈萨克人对农业技术有一定的了解,但除南部锡尔河流域等局部地区外,从事稳定农耕生产的家庭数量始终有限,游牧仍是其主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1]。然而,至 19 世纪下半叶,在继续维持游牧经济的同时,哈萨克部落社会逐渐显现出向定居与半定居生活方式转变的趋势。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游牧迁徙规模的缩减、迁徙频率的降低,以及土地使用权逐步由部落集体向家庭或个人层面的转移。

尽管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哈萨克社会的经济生活整体仍以畜牧业为主,但在乌拉尔斯克、锡尔河及塞米巴拉金斯克等地区,定居或半定居模式逐渐兴起,部分区域农业人口比例已超过半数^[2]。1897 年人口普查资料亦显示,虽然多数哈萨克贵族仍保持游牧生活,但已有部分贵族家庭开始转向农耕生产^[3]。

从生态与生产逻辑来看,游牧经济是在农业资源有限的生态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高度适应性生产方式,它通过长距离迁徙,充分利用食草动物的移动能力与草原资源的季节性分布,将人类无法直接利用的植物资源转化为肉类、乳制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4]。在这一经济形态中,部落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协调功能:它不仅组织成员进行季节性迁徙,还负责夏季牧场的分配与使用权协调^[5]。因此,部落制度并非游牧社会的附属结构,而是其生产方式得以持续运作的制度条件^[6]。因此,游牧并非一种“落后的生计方式”,而是一套与部落社会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

然而,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这一制度基础开始面临系统性挑战。布凯汗在 1896—1901 年参与谢尔宾纳考察期间的记录显示,草原诸省约 63% 的哈萨克家庭已不同程度参与农耕生产,但畜牧业仍占其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牧民在冬牧场建造固定或半固定住房,居住时间长达 8 至 10 个月,仅在春夏季进行短距离转

场;在草原北部地区,迁徙距离普遍缩减至 2.1—5 公里,历史上跨越数百公里的长距离游牧几乎消失^{[7][8][9][20]}。

在自然环境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游牧迁徙的显著收缩,主要源于 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推行的移民与土地政策。随着大量来自帝国欧洲部分及东欧地区的斯拉夫农民迁入哈萨克草原,传统游牧所依赖的广阔草场不断被切割并转化为农地。1868 年的《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1881 年的《农民前往国家空闲土地的临时条例》以及 1908 年的《向国家土地移民法》等,这些法律框架不仅将草原地区牧民的草场国有化,还允许将其中的部分草场改造为农地。在此浪潮的推动之下,斯拉夫农民不断迁移并来到哈萨克草原。1889 年 7 月颁布的《移民安置法案》允许任何有意向的农民,在存在“免费土地”的情况下申请移民许可,移民在选定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并进行登记后,每户农民约能分配到 16.4 公顷的土地,并享有三年免税期和各类住房及粮食援助与贷款的资格^[21]。

到 19 世纪晚期,移民的趋势还在加速。尤其是 1891 年至 1905 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最终贯通也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的移民冲动。1897 年,仅额尔齐斯河右岸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就出现了 54.4 万俄罗斯人和约 8 万名乌克兰人,分别占到了当地人口比例的 12.8% 和 1.9%^[22]。经历了 19 世纪下半叶的移民浪潮之后,哈萨克草原上已经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斯拉夫人聚居区,而此前完整的游牧草原也被新的行政区划和移民切分。这些移民多数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获得土地、从事农耕,大量占据了此前游牧所需的草场,也极大地改变了哈萨克部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此外,俄罗斯帝国的行政改革和草场土地产权变更也极大地破坏了传统的以部落为核心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在 19 世纪下半叶,随着俄罗斯帝国完成对其他区域如希瓦、布哈拉和浩罕的军事征服,并将哈萨克大草原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下,一场前所未有的行政改革伴随着帝国的现代化徐徐展开。一方面,通过 1868 年的《草原管理条例草案》等法律文件,帝国在哈萨克的草原上,从法律角度确立了私有产权,为后续欧俄农民的大规模迁入及草场土地的攫取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条例第 210 条还明确宣告了将哈萨克人占有的土地国有化,只允许哈萨克人集体使用而不拥有其产权^[23],

而游牧民为争夺冬牧场的使用权就必须通过耕作土地和建造房屋等方式来表明其定居意向,以获得俄罗斯政府的认可和保护。此外,作为个人或家庭单元的哈萨克牧民也可以将土地租赁给俄罗斯移民以进行农业开发来获得合法的土地所有权。这些措施都在推动着游牧民的定居化和土地资源的商业化。

另一方面,帝国通过确立基于地理位置的行政单位划分,打破了基于部落单元的传统划分,努力促进部落社会向更加定居化、聚落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七河省与锡尔河省管理条例》以及《草原诸省管理条例》等文件的确认,行政单位(尤指乡级单位)的划分应依据地理位置和领土分布,而不再单纯依赖于传统的部落或氏族界限。草原地区被重新划分为三个独立的行政实体,这三个省份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州或地区,之下再划分出数量不等的行政区,并进一步包含多个更小的行政单元。相较于流动的牧民生活,固定的行政边界与明确的居住地明显更便于政府的监管与管理^[24]。

在改革前,同一部落的哈萨克人根据部落来共同管理和使用草场资源——他们在冬季时分散在各个牧场,夏季则沿固定的迁徙路线迁移至夏牧场。然而,改革措施明确规定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划分为夏季牧场和冬季营地两种形态,并要求牧民按照新的行政边界进行迁徙,否则将利用法律进行制裁(见图1)。这一举措限制了部落按传统方式自由选择牧场的权利,并引导牧民逐渐进行干草储备以供冬季使用,使部落居住模式由季节性迁徙转变为主要在冬季牧场上长期定居,显著缩短了迁徙距离和时间,极大地限制了牧民生活的流动性,对草原社会结构和生活习俗产生了深刻影响^{[25][26]}。

(二)草原社会的解构:土地私有化、部落松动与贵族衰落

生产方式的制度性调整并未止步于经济层面,而是进一步引发了哈萨克部落社会内部结构的重组。随着土地制度与行政体系的变化,原本以部落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开始松动,其影响集中体现在亲属组织、精英结构与权威来源的转变之中。

随着土地使用权逐步个人化,原本由部落或更大集体统一管理的资源分配方式被重新编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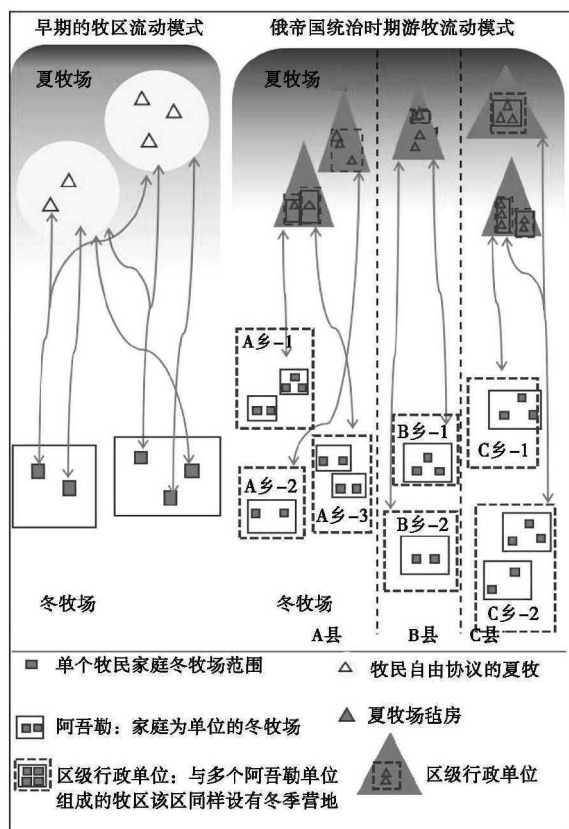


图1 早期牧区流动模式与帝国统治期间流动模式的对比^[27]

家庭开始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占有和经营土地,核心家庭逐渐取代大家族(阿塔)成为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位,而部落(乌如)内部基于协作的生产模式随之弱化^[28]。在哈萨克社会结构中,多个氏族联合形成的大社群被称为“乌如”。乌如能够对其成员提供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保障,也是一种应对外部冲击的社会机制。例如,当某个家庭因食肉动物袭击或极端恶劣的冬季条件而遭受牲畜损失时,乌如内的其他成员会伸出援手,提供必要数量的牲畜以帮助其恢复生产^[29]。然而,在这一时期,乌如的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松动的迹象,部落成员逐渐从传统的乌如组织中脱离,部落内的团结与合作关系面临解体的压力^[30]。

与此同时,帝国行政改革深刻改变了传统政治精英的制度位置。苏丹与世袭贵族的政治地位被逐步废除,行政与司法职位开始向职业官僚体系转移。自1869年1月1日起,大苏丹和苏丹的统治地位被正式废除,县署的首席官员不再由哈萨克苏丹担任,而改由俄罗斯人出任县长,副县长职位则留给哈萨克人。根据1897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哈萨克贵族在整体人口中的比例已降至极低水平,仅有1009名被认定为部落贵族,其中包

括 881 名世袭贵族和 128 名因个人功绩或特殊地位而被授予贵族身份的人。这一数字在全帝国所有哈萨克人中的比例不足 0.03%，且仅占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世袭贵族总数的 7.3%^[31]。新兴精英群体更多依赖教育背景、行政经验与语言能力进入权力结构，其合法性来源亦由血缘与传统权威转向制度授权。新兴精英不仅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精通鞑靼语和俄语，而且在处理司法和法律事务方面的专业性也显著提高。这一转变使得他们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的地位和权威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32]。

这一变化表明，现代帝国并非简单“消灭部落精英”，而是通过重塑权力以获取路径，使传统部落权威逐渐失去制度再生产能力。

（三）法律体系：习惯法的重构与“比”的角色演变

随着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哈萨克部落社会中以习惯法为核心的治理机制，也在俄罗斯帝国法律与行政体系的持续介入下经历了深刻重构。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法律替代”，而是通过重新界定司法权威的来源、适用范围与执行方式，逐步改变了部落社会内部调节冲突与维系秩序的制度基础。

在传统哈萨克社会中，习惯法并非一套抽象或成文的法律规则，而是一种深度嵌入部落文化、价值观、游牧生活方式的实践体系。它规范着个体与社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涵盖继承、财产分配以及冲突解决等多个方面。例如，习惯法规定，若经济条件较为宽裕的亲属拒绝向生活困难的亲属提供必要支持，后者在道义上有权从前者处取用一定数量的物资；此类行为并不被视为盗窃，反而被理解作为一种体现勇敢与正义的行为。在这一伦理框架下，拒绝为无家可归者或贫困者提供食物与庇护，可能构成被追诉的行为。由此可见，哈萨克习惯法不仅反映了部落社会中以互助与共享为核心的道德经济，也体现了一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正义观。

然而，正是在这一高度自治、以地方实践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俄罗斯帝国看到了其推进中央集权治理的制度障碍。在帝国现代化进程中，边疆地区多元而独立的司法实践，被视为削弱国家直接干预能力的重要因素。监察员帕伦(Palen)就曾

特别强调，消除哈萨克人的部落关系在法律层面的必要性，称“基于共同祖先形成的部落联合可能会阻碍草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33]。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帝国开始通过制度化立法手段，对草原地区的法律秩序进行系统性重组。

1867 年的《塞米列琴斯克和锡尔河地区管理暂行条例》、1868 年的《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相继出台，标志着帝国在法律与行政层面对哈萨克草原实施更为严格和直接管控的决心。通过这些条例，帝国逐步建立起一个由参议院、军事司法委员会、省公署、县法院以及民间法庭构成的五级司法体系，并以帝国通行法律作为裁决依据，力图实现司法实践的统一化与标准化。传统的部落集会制度在这一过程中被正式废除，而原本基于部落的司法实践则被整合进帝国的法律框架之中。

在这一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比”这一传统仲裁者的角色并未立即消失。相反，帝国在初期选择对其加以制度化吸纳，使其成为民间法庭中的正式司法角色，主要依据习惯法来处理大多数民事案件及部分轻微刑事案件。然而，这种保留并不意味着对其原有权威的承认。1891 年，“比”的称谓被废除，转而采用俄罗斯帝国统一的“民族法官”(народный судья)一词，尽管其审理内容在形式上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其司法地位已被重新嵌入帝国行政体系之中。由于缺乏独立的行政执行权力，“比”在裁决落实与惩罚执行方面高度依赖帝国机构，其实际权威因此受到显著削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比”的制度属性进一步发生变化。候选人资格被重新设定，最低年龄要求由 25 岁提高至 35 岁，但若曾接受过俄罗斯学校教育，则可例外提前任职；其选拔过程需要经帝国当局批准，并引入竞争性选举机制。1893 年后，“比”的审判权限再次被压缩，仅能裁决涉案金额和拘留期限均在严格限制之内的案件，超出范围者则移交俄罗斯法院处理。例如，民间法庭仅能对价值不超过 300 银卢布（相当于 15 匹马或 150 只羊）的案件作出裁决，而只有涉案金额低于 30 卢布的案件，其判决才具有终局效力^[34]。这些制度调整体现了俄罗斯帝国通过程序化、分级化手段，对地方司法权力进行持续收缩的治理逻辑。

在实践层面，这一变化对部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比”的权威与调解能力不断削弱，部

落成员在面对土地纠纷、税收压力以及移民冲突时,逐渐失去一个能够有效代表其利益的制度性渠道。19世纪下半叶,大量来自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斯拉夫族移民进入哈萨克草原,土地所有权成为最具争议性的议题之一。面对草场被征用、定居点扩张以及税负加重的问题,部落居民曾依赖比进行调解与申诉,但在其权力受限的情况下,这一机制难以再发挥实质性作用,进而削弱了民众对传统司法权威的信任。

与此同时,许多与游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司法实践,也在新的帝国法律体系下遭遇冲击。在传统体制中,部落成员可根据放牧节律,在祖先墓地或合适的草原地点召开集会,甚至在重要人物葬礼期间迅速集结人群进行仲裁,以高效地解决纠纷。然而,帝国法庭往往无视这些地方实践经验,不仅在空间上选择远离牧区的固定地点,在时间上有时甚至在冬季开庭庭审,对需要长途跋涉的牧民而言几乎难以参与。1897年,《吉尔吉斯公报》刊登的一位哈萨克作者即生动描述了参与官方法庭集会的经历:许多人丢下手头的工作匆忙赶来,而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则根本无力前往另一个村庄。当集会在开幕三四天后宣布结束时,许多人还在路途中。他们虽然在旅途中投入了相关费用,但最终却“空手而归”^[35]。

综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哈萨克部落社会所经历的剧变,并非某一单一政策的直接结果,而是现代帝国通过空间固定、社会再编组与规范重构等多重治理技术,对本土社会秩序进行系统性重编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部落作为一种嵌入生产、权威与法律的社会秩序,逐步丧失其制度核心地位,并被转化为一种去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形态。

四、结语:现代帝国治理、社会秩序转型与比较视野

本文以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哈萨克社会为案例,考察了传统部落社会在帝国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纳入国家治理的历史路径。文章的核心发现并不在于指出某一具体制度的消失,亦不在于强调某项单一政策的直接后果,而在于揭示一种更为深层的结构性转型过程即随着帝国治理形态的转变,本土社会秩序赖以运作的制度条件发生了系统性改变。

研究显示,哈萨克部落社会的转型并非“被动瓦解”,也并非由短期冲击所触发,而是源于帝国治理逻辑的持续介入。在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在行政能力、技术条件与治理目标上的变化,使其逐步从依赖地方中介的传统统治形态,转向以行政理性、空间规划与规范治理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这一转变并未以彻底否定地方制度为起点,而是通过制度重组与功能置换,逐步削弱了部落社会原有的运行基础。

具体而言,帝国通过土地制度与移民政策来重塑草原空间结构,将以长距离迁徙为特征的游牧生产方式压缩并引导至半定居形态,从而削弱了部落在资源协调与风险分担中的核心功能;通过行政区划与官僚体系的引入,原本以血缘、声望、协商为基础的权威结构被重新嵌入国家治理框架的边缘位置,其政治与司法影响力显著下降;通过法律体系的整合,习惯法及“比”的调解机制在形式上得以保留,但其适用范围、裁决效力与执行能力被持续限制。这些变化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构成了一套针对草原社会的制度性重组过程。

从这一视角看,部落并非在现代化进程中“消失”,而是逐步失去了其作为社会运行中枢的制度地位。部落仍然以亲属网络、社会关系、身份框架的形式持续存在,但其已不再承担组织生产、分配资源与整合社会秩序的核心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联解体后哈萨克社会中部落认同的再度显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秩序的复原,而是发生在制度结构已被深刻重塑之后的一种社会关系再配置。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有必要将当代部落认同的实践,置于更长时段的制度变迁史中加以理解。

在理论层面,本文提出并具体化了“现代帝国治理”这一分析视角。既有帝国研究多强调帝国以差异化统治、间接治理与制度多元为特征,从而在分析上将“帝国”与“现代国家”加以区分。本文并不否认这一判断的历史合理性,但通过哈萨克社会的经验指出,帝国本身亦可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治理逻辑的结构性转型。所谓“现代帝国”,并非指帝国在政体形式或意识形态上趋同于民族国家,而是指其在治理实践中逐步引入以可测量、可规划与可规范为核心的治理理性,并将这一理性系统性地施加于地方社会秩序之上。

通过区分传统帝国与现代帝国,本文不仅为理解哈萨克部落社会的历史转型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解释框架,也为重新思考帝国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位置提供了启示。现代性并非仅通过民族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工程展开,其重要一环亦发生在帝国晚期的治理转型之中。由此,哈萨克社会的经验提示我们,应当将帝国视为现代性扩散与社会重组的重要中介,而非现代国家出现之前的静态背景。

总体而言,哈萨克案例所展示的,并非一条通向现代性的单一路径,而是一种经由现代帝国治理中介、再进入民族国家与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复杂历史轨迹。本文希望借此推动历史社会学与民族社会学之间的进一步对话,将地方社会的制度变迁,重新纳入关于帝国类型、国家形成与现代性多重路径的比较研究之中。

注释:

①传统哈萨克社会内部结构以家庭(отбасы)、阿塔拉斯(аталас)、乌如(ру)、玉兹(жүз)为基础,其中,阿塔拉斯、乌如和玉兹都是与部落相关的结构。简而言之,阿塔拉斯涵盖同一始祖至第七代的直系及旁系亲属,该概念强调成员间的婚姻忌讳;乌如是一种以血缘谱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大型父系亲属集团,按照父子相承的继承原则,通常以第 15 个祖先名确定乌如的名称并维持一种严密的谱系(шежіпе)结构。

②哈萨克各玉兹、各部落均有其传谱系的人。这些谱系世代相传,哈萨克谱系曾用鹅毛笔记录下来保存在可汗、苏丹和部落头目手中,后失传。现在哈萨克谱系包括 7 世纪到 20 世纪的哈萨克部落世系。但是,这些谱系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只知道一代一代的顺序,至于每一代人生活在什么时代则不甚明了(哈萨克族简史,2008 年版第 18 页)。

③俄罗斯帝国的政治家阿列克谢·列夫申在其 1832 年的著作中提到,俄罗斯帝国在草原地区通过支持鞑靼毛拉、介入伊斯兰宗教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将宗教资源纳入其治理实践之中,使宗教成为联结帝国权力与哈萨克部落社会的制度性中介。与此同时,帝国陆续设立贸易中心、学校与清真寺,并为部分苏丹建造住宅,同时成立可汗委员会、部落管辖区和边境法院,为可汗及氏族官员提供薪金,并负担毛拉与秘书等职务人员的经费开支。

参考文献:

- [1]Cameron, S. The Hungry Steppe: Famine,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Soviet Kazakhstan[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Barkey, Karen.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3]Service, Elman R.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4]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M].纳比坚·穆哈穆德罕,何星亮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5]Нусупбеков, А. Н.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ом 2 [M]. Алма-А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1979: 248-249.

[6]《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8.

[7][9][25][32]Султангалиева, Гульмира С. Казахские чиновн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XIX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власти [J]. Cahiers du Monde russe, 2015 (4): 651-679.

[8]Левшин, Алексей Ираклиевич. Описание киргиз-казахских, или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х орд и степей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Карла Крайя, 1832.

[10]Sabot, Steven. Comparing American and Russian internal colonization: The touch of civilisation on the Sioux and Kazakhs [J].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2(1): 29-51.

[11]Гавердовский, Ж. Журнал (дневник) 1803 г. [M]. В: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русски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VI-XX веков. Том 5.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2007.

[12]Абышкаев, А. Каратагинские кыргызы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в. [M]. Фрунзе: Илим, 1965.

[13][31]Sultangaliyeva, Gulmira; Tuleshova, Ulzhan; Werth, Paul W. Nomadic nobles: Pastoralism and privilege in the Russian Empire [J]. Slavic Review, 2022 (1): 77-96.

[14]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5]Barth, Fredrik.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8: 9-38.

[16]Масанов, Нурбулат; Абылхожин, Ж.; Ерофеева, И.; Алексеев, А.; Баратова Г.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народы и культуры [M]. Алматы: Daik-Press, 2001.

[17]施越.俄国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3.

[18]Букейхан, А. Тандамалы: Избран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M]. Т. 1. Алматы, 2002 (127): 97-101.

[19][28]Aldashev, Gani; Guirking, Catherine. Colonization and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Kazakhstan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7: 413-430.

[20]Ferret, Carole. Spatial discontinuities and nomadic pastoralism in Inner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14(4): 957-996.

[21]Olcott, Martha Brill. The Kazakhs [M].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5: 125.

[22]Demko, George J. The Russian Colonization of Kazakhstan, 1896-1916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9.

[23]Westwood, John N. Russia, 1917-1964 [M]. London: Batsford, 1966.

[24][26]Martin, Virginia.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Middle Horde Kazakh Judicial Practices and Russian Colonial Rule, 1868-

1898[D].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996.

[25]Броневский,Б.М.Записки Б.М.Броневского о киргизах [J].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830:74.

[27]Dörre,Andrei.Land,people and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The case of rangelands and mobile pastoralists in Central Asia [M].
In:Disciplinary Spaces:Spatial Control,Forced Assimilation and
Narratives of Progres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2017:65-90.

[29]Владимирцов,Борис Яковлевич.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монголов:Монгольский кочевой феодализм[M].Москва-Ленин-
гра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34.

[30]Shaukenov,Ali.Administrative and territorial changes and

legal reforms in the Kazakh Steppe in the 19th century [J].Asian &
African Studies,2014 (1):89-109.

[33]Abenova,B.Regional Policy of the Russian Empire in Ore-
nburg Krai [M].Saarbrücken: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3:28.

[34]Кожоналиев,С.К.Суд и уголовное обычное право кир-
гизов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M].Фрунз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
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1963.

[35]Абселяков,С.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я из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ого уе-
зда[J].Киргизская степная газета,1897(10).

(责任编辑 柯艳萍)

From Indigenous Order to Modern Imperial Governance:The Transformation of Kazakh Society under the Russian Empire

Patihaxi Talafubieke ZHANG Zhe

Abstract: Taking Kazakh society under Russian imperial rul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indigenous tribal social order was reconstituted under conditions of imperial moderniz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Kazakh society did not originate in Soviet-era social engineering, but began earlier during the Russian Empire's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imperial formation to a modern mode of imperial governance. As governing capacity expanded through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reorganiza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a civilizational ideology, the empire intervened systematically in social orders previously embedded in nomadic production and tribal structures. Through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land regimes, and legal regulation, Kazakh society was incorporated into a system of governance characterized by measurability, regulation, and state intervention. Theoretically,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modern imperial governance", emphasizing that an empire is not a static form of governance based on local customs, but rather is transformed systematically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organiz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rationality, thereby deepening the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perial type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local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 Kazakh Society; Tribe Order; Russian Empire; Modern Imperial Governance